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 图书馆所藏蓬莱慕氏书库述概

吴 晓 铃

多伦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虽然只有五十年历史，但是和北美的许多中型汉籍图书馆比较，藏书高达十万余册，已经具有现代专业图书馆的规模了。

蓬莱慕氏藏书中的绝大部分古籍的收入经过是几经周折的。1933年3月，驻在河南省开封府的英格兰教宗韦廉·怀德(Rev. William C. White)主教，因公到北京巡视所属教堂，他的朋友韦廉庇托斯(William Pettus)告诉他：蓬莱慕氏所藏约四万册的珍本古籍有出售的迹象。藏书主人慕学勋(1880—1929)，字玄义，山东省蓬莱县人。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其后在德国驻北京公使馆任中文秘书达十七年，直到逝世。慕氏雅好积书，二十五年间所聚聚多，他的藏品主要是做为一个典型的传统式学者的必备古籍，其中的十分之一属于稀覯善本，余者多系清代刊本、稿本、钞本和老档。慕氏逝后，其子继承父藏。由于远赴外省供职，无法捆载远去，所以待价而沽。慕氏之子秉承遗志，坚持购藏对方须为研究机构，而诸多此类性质单位的藏书均具相当规模，若购入慕氏藏书全部，势必出现多种副本，因而迟迟不能售出。其时，法国汉学名家保罗·伯希和教授(Prof. Paul Pelliot)正来我国访书，颇有问鼎之意。韦廉·怀德主教对我国文

化具有浓厚兴趣，尽管慕氏藏书对于他在开封的教堂并无多大的利用率，但是他一心为多伦多市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设想。做为安大略省公民，怀德主教把那个博物馆视为本省文化生活的明珠。³⁹须知，在1933年，那个博物馆便以藏有大量的我国古文物驰名北美，增加一个丰富的中国图书馆显然属于进一步的逻辑必然性。怀德主教深恐失掉难得的契机，迅速地提出加币一万零五百元购买全部书籍，慕氏遗族同意了这笔交易，怀德主教当即预付了三分之一的定金，同时给他在多伦多市的挚友柯迪（H. J. Cody）博士写信说：“我无法描绘这个慕氏书库的优点，购买其全部藏书而向你勒索钱财似乎象是在干坏事，然而我深信在将来这会对多伦多市，对加拿大具有特别突出的重要性。我做的这件事势将成为我能给多伦多市所尽的最大劳绩了。”这封信的含义完全获得柯迪博士和博物馆的其他董事所理解。在几天内，奚格蒙德·塞密勒博士（Dr. Sigmund Samuel）和罗勃特·孟德爵士（Sir. Robert Mond）专为购入慕氏藏书捐助了加币五千元，这两位都是博物馆的终身董事。余下的加币四千五百元则由约翰·杰·福开森教授（Prof. John J. Ferguson）募齐。福开森教授也是安大略省人，做为一位中国艺术史的专家，他当时在北京旅居。这笔款项里还有怀德主教的私储。因此，慕氏藏书便被正名为“多伦多大学中文图书馆”。

应该指出，一直到1935年初，这批古籍依然保存在北京进行编制草目工作。编目工作是由北京美国公使馆退休海军专员埃·维·杰列斯（I. V. Gillis）领导下的十名中国雇员进行的。编目法是根据麦克吉勒大学的葛思德图书馆制定的方案进行的。1935年1月，编目工作基本完成，正在准备向加拿大海运，恰值当时我国政府对于古籍出口制定了极为严格的法规，在1851年以前印行的书籍则绝对禁止外流。这时，通过福开森教授的疏通，问题得到部分解决。在他的建议下，以古物保管会的名义，由袁

同礼、张庾楼和徐鸿宝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鉴定慕氏藏书。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把慕氏藏书中的三种明代刊本赠予国立北平图书馆，该馆则回赠一批当时中国出版的新书。此外，还把几十册有关广东省海关的档案赠予故宫博物院所属的文献馆。有趣的是，以袁同礼为首的鉴定委员会选留的三部明版书竟不是慕氏藏书里的最为鲜靓的珍本。

慕氏藏书于1936年6月运抵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古籍数量已经增加到五万册，其中包括怀德主教于1933年至1935年间搜集到的约一万册山东和河南两省的方志以及当时出版的中国美术和考古书。另外，怀德主教在我国传道期间搜集的五千余帖拓片和版刻也一并献出。这使多伦多大学所藏汉文古籍在北美与葛斯德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形成鼎足而三之势。这批以慕氏所藏为主的图书馆，在1937年11月正式开馆。怀德主教多年的梦想实现了，他被聘为首任馆长。

也应该指出，多伦多大学关于中国学的研究，并未能充分发挥慕氏藏书应起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大学没有发展和充实在经济上的支持，从1937年到五十年代初期增加的书刊为数寥寥。与此同时，美国的许多高等院校对于发展中文藏书迅如疾风骤雨。鉴于这种可悲情况，在1953年被任命为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的德卜逊教授（Prof. W. A. C. H. Dobson），从多伦多市某合作社组织募得捐款加币四万二千元购书费，在同年亲自作东亚采访中文书刊之行，历时数月，收得大量的丛书、期刊、参考书和新版古典名著，如：《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国学基本丛书》、《十通》、百衲本《二十四史》和一套完整的《东方杂志》。这样，就填补了慕氏藏书缺少期刊和现代出版物之间的缺点。由于德卜逊教授的实际行动，引导图书馆从一个传统式的学者书斋跨进为一个现代科研单位。

1961年，慕氏藏书加上美术、考古书和五千帖拓本，再加上

德卜逊教授补购的图书和期刊集中起来，迁移到多伦多大学的文理大楼第八层，这就是驰名北美的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我在大学客座时，每周除了在星期二、四到东亚学系为本科学生授“中国古典小说”课和为博士班学生授“《金瓶梅》研究”课各二课时外，绝大部分光阴都浸沉于东亚图书馆的邛架之间，特别是慕氏藏书几乎全部经眼，司典守责的沧州张老曾说：“你是唯一的一位看过慕氏藏书全貌的国人。”

东亚图书馆所藏慕氏书仅记册数，不标种数。例如：宋版五册、元版九十八册，明版三千四百十四册；撰者手稿本九册，明稿本和钞本七册，清稿本和钞本三百二十九册。根据我逐橱检查的目验，总类约为三百七十八种（与该图书馆统计数字三百七十一一种多出七种。然而我的统计也并不够精确，因为有几部清代铜版巾箱本没有计入）。看将起来，慕氏藏书很有彻底整理和编制细目的必要。

慕氏藏书相当芜杂，做为一般阅览，显然门类不够广泛；做为专业利用，则又嫌有所不足；只能说是一个旧派读书人的私藏，足供个人遮眼消闲而已。其中一些精品大约也并非主人独具隻眼，着意收贮。例如：明代永乐初，内府精镌阔大本《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虽曲家亦少有致意者，不稔何以慕氏独斥巨资宝而藏之。又如：慕氏除已藏有号称“四大千”之一的《文苑英华》外，复得中土罕见的《广文苑英华》二十六卷，亦不稔何以慕氏有如此高明鉴定能力。又如：明万历间，延陵吴从先在同时文士群中本无足称，而慕氏则对之似有深嗜，藏有吴氏《小窗自纪》、《小窗清纪》、《小窗艳纪》和《小窗别纪》四种多部。至于戏曲小说之属则质量未臻上乘。戏曲仅有明刊徐渭的《四声猿》杂剧二部。小说则有明刊《花阵绮言》残帙，明刊《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及清刊《第一奇书》、《说唐全传》、《好逑传》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唯另有钞本《郑

氏应藏《五代纪》五十卷一百回，与通行之《求无获斋》等七种刊本《台湾外纪》大异，容另为文论之。

这里，我只略记如次数种，以其各具特色故也。

《福堂寺人小草》，明刘若愚撰。清初钞本，曾藏黄丕烈家，然未见《蕙圃藏书题识》著录，可能是书贾伪钤黄氏印记，疑莫能明。此书即刊本之名《酌中志》者，然较刊本多出一卷，可宝也。

《云川阁集》不分卷，清杜诏撰，稿本，曾藏鲍廷博家，有“嘉庆十九年闰二月阅毕，博记。”及“知不足斋鲍以文藏书印”章。此书论述自战国迄明末历朝兴亡原因，属于史论范畴。

《宋明兵制备览》四卷，撰人佚名，时代亦不详。其书对于宋、明两朝兵制研究至为详瞻。

《礮花做法》不分卷，撰人佚名，疑是晚清作品。其书对于焰火及花炮制作方法颇有可以借鉴之处。

《问诗楼合选》四卷，乾隆间某王室妇天然主人选，米色丝栏精钞本。其书首选其绝句及律诗二十一首。次选扬州杨氏习幽女史七律二首。又次选苏州沈氏雪楼女史绝句及律诗八首。最后以粤南徐氏梅轩女史七律六首为殿。此三女诗人皆选者闺中膩友，或曾居明珠邸，或曾馆于慎郡王府，福慧难兼，先后宿草，故天然女史选录遗作，以抒“今昔去来之际有足感者”之思。

《吴可读奏议》不分卷，清吴可读撰。钞本。其奏稿痛诋慈禧力主光绪继统之咎，复收入张之洞、翁同龢等关于吴氏自杀事件之反应。

为此文时，已住入医院一周，所记多凭追忆，缺欠殆不可免，他日得暇，当将慕氏藏书件系科分，编为全目公诸于世。

一九九〇年元月十一日于宣武医院四楼四四一室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